

· 大有党史文丛 ·

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

——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

XIANDAI ZHONGGUO DE
ZHUYI YU ZHENGZHI

YI DULI PINGLUN WEI ZHONGXIN DE TANTAO

张太原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 大有党史文丛 ·

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

——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

XIANDAI ZHONGGUO DE
ZHUYI YU ZHENGZHI

YI DULI PINGLUN WEI ZHONGXIN DE TANTAO

张太原 / 著

责任编辑:郭 娜

封面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张红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张太原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01-018821-8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5916 号

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

XIANDAI ZHONGGUO DE ZHUYI YU ZHENGZHI

——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

张太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86 千字

ISBN 978-7-01-018821-8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独立评论》概论	9
一、《独立评论》的创办宗旨	10
二、《独立评论》的社员及其主要撰稿人	22
三、谁是《独立评论》的经理人	34
四、《独立评论》的社会影响——社会舆论的“中心”	48
第二章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独立评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	65
一、知己知彼：《独立评论》对中日情势的认知	66
二、能和则和：《独立评论》的对日策略	75
三、当战则战：《独立评论》的抗日方针	98
四、反抗和建设：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民族主义	125
第三章 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独立评论》对国民党的态度	129
一、不打不相识：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渊源关系	130
二、“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独立评论》对国民党的批判	152
三、“有政府胜于无政府”：《独立评论》对国民党政权的维护	174
四、“出山要比在山清”：自由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政权	187

第四章 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204

 一、我们与你们: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 205

 二、世风与语境:30年代中国的学习目标和榜样 215

 三、有主义的政党:《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赞许” 225

 四、“绝对反对他们的武力手段”:《独立评论》对共产党的批评 241

结 语 260

参考文献 276

导 言

进入近代以后,外国的侵略打乱了中国的传统秩序和自有的社会进程。各种势力的矛盾、冲突、斗争和互动形成了近代社会“激变”与“难变”的奇观。一方面是瞬息万变,“因为时代变得太剧烈了,运动者来不及时时进步以适应环境”^①;“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②。另一方面是依然如故,“戊戌的维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时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动摇那个攀不倒的中国本位”^③;“辛亥鼎革后,政体虽已改革,但朝野上下的处身行谊与观念习惯等却均无大变动”^④。往往凸现于人们眼中的是“激变”,而潜隐于人们心中的是“不变”。加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一些沿海地区或大城市可能是“激变”,而一些内陆省份或乡村可能是“不变”。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抑或是同一时空上,都存在着“激变”与“不变”两种状态,由此使“中国成了一个‘多重社会’,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多重的,把整个的历史完全同时来放在中国”^⑤;“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四方八面几乎

① 蒋明谦:《西方文化的侵入与中国的反应》,《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第18页。

② 胡适:《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1919年10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2页。

③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第145号,第6—7页。

④ 张忠绂:《迷惘集》,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⑤ 蒋明谦:《西方文化的侵入与中国的反应》,《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第20页。

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①。

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为探寻其中的脉络和奥妙,国内硕学常常引入外来的理论框架来加以条分缕析。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成了用中国的历史来证明外来的道理,徒为西方价值的普适性作注脚。到今天,即使在大力强调“中国模式”的语境里,学术领域“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现象仍然随处可见,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就像拿着一个探照灯照过来,只是从他们的理念和感觉出发,看到其能看到的有限的范围,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在近代中国,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可能是为外国的理论而存在的。简单的以外部产生的理论来条理中国事实,就是把历史过程当成了一个完全的客体,使之成为几近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冷冰冰的被上了某种发条的历史。如果研究者与所研究的对象毫无精神层面的关系,安能真正体味和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更谈不上陈寅恪说的“同情之了解”与“不得不如是”。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架构,都有主观的想象和嫁接,而有许多行为或事实,未必都符合理论或规律,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或者说人的灵性所致,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恰恰缺乏对人的灵性研究。相对于历史的复杂性,现有的理论或解释框架显然远远不够。实际上,对于研究者而言,悟性,即对历史的感悟远大于对任何理论的需要。理论在短时间可以掌握,也可以套用,但是悟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且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对于史学研究,一般人往往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如果对历史没有感觉,则很难做到与前人对话,只能妄加臆测,自说自话。此外,套用外来理论,还容易忽略大量的史实,而不能揭示史事之间本有的盘根错节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是不要明了和掌握外国的理论和解释框架,而是要使之化为实际的问题意识,隐藏在具体研究的背后,做到“融西而不见西”。

从近现代思想的既存研究来看,还往往以对立、斗争的眼光审视各种思潮流派,不仅容易夸大不同思潮的差异,而且容易忽略各种思潮之中普遍意识和认知。比如激进与保守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种范式,当然有其方法论的意义,但是这一模式不能概括所有的思想流派,也很难解释具体的思想。其实,近代

① 唐俟(鲁迅):《随感录五四》,《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第326—327页。

以来,“激进”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真正的“保守”并没有市场,即使被指保守者,也往往暗藏激进。维新、革命、“左倾”、进步和现代化,这些话语几乎成为绝对不可动摇的价值,可谓群趋如潮,无论哪种力量都有意无意地持之在身和追逐不已,这自然推动近代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但是,不可否认,在一些方面,正是人们出于追求进步的豪情壮举,却把历史推向了与初衷相悖的境地。历史的实情往往悖于常理,守旧者未必落后,趋新者也并不一定进步。换个角度,如果超越激进和保守这一模式去平实地考察历史上的思想派别,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在众说纷纭中也有共同的思想资源,也有普遍的为各方所接受的甚至已化为无意识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如此做法,似乎可以改变研究思想史划派标牌的简单做法。同样的学说,在此处和彼处,对于不同的人或群体,认同的程度,选取的方面,产生的效力也是有差别的。拂去障蔽,回归本相,则可发现对立中也有“同一”。知识、思想、信仰与情感、政治立场、利益考量,对某个时期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矛盾的统一体。信的未必爱,爱的也未必信。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复杂,貌似合乎情理的分门别类,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从宏观的整体的视野来看,在同一问题之下,往往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及其努力。只有真切地体味特定时空下不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才能了解历史曾存在的多样性,特别是揭示那些被忽略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主体。历史的演进,就像一部部电影,如果只有主角,没有配角,情节是无法展开的。同时,从具体和微观出发,又不要被史事的繁复和纷争遮蔽了慧眼,要懂得相灭相生的道理,要通晓史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不要被那些由当事者过于夸大了的与众不同和天下独尊所迷惑。面对波云诡谲的历史,既要善于同中见异,又要善于异中见同。当然,异同也有多重,切不可从一个维度就轻言实相和全貌。

以往人们对于“历史经验”的热衷远远大于对历史本事的探求,到头来不过是形形色色的一孔之见。然而,如果打通历史的各种关节,就会呈现一种“大历史”的脉络,可形成一种自在的历史启示。在一个关节点上,历史往往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能够把一种业已发生的史事放在多种可能性的语境中去审视,历史的是非得失则可不言自明。同时,在具体专门的研究过程中,探求个体的普遍联系,分析其所连带的各个

方面,给所有在场之人和相关之事以表现的机会,让失语的重新发言,把遗忘的重新拾起,依照近真的原则,按一定的时空顺序依次展开。在此基础上,揭示现象和表面背后暗藏的史实,呈现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从而可窥见大历史或整体史的面貌及其生成演变过程中所蕴含的“义理”。

每一种思想文化都不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后人研究前人的思想往往很难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特别是常常以已知道的结果或已形成的认识去观察最初的问题。实际上,要弄清一种思想文化究竟是怎么回事,需要“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来介入,采取多维视角,利用不同渠道,真切地再现那时的历史场景,探究思想文化产生的原生状态,进而重塑历史语境,给一种思想文化以立体式的全方位的感知和体认。一个人的思想与心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心理与表达出来的思想是不同步的,甚至是不一致的。况且,人的心理还存在着有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因而某种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思想,其背后往往是另一种心态。研究者应该试图透过作者公开的各种言说,窥其真实心态;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路径,走进人物的心灵去了解他的真实意图。

思想家留存的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后人往往难以捉摸,要真正地解读其本义,须充分利用其前后左右的各种史料,引入实证的方法,从而使较抽象的思想落到实处。傅斯年曾说,“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①陈寅恪也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②但是,后人对此说多有误解,从而使治学变成一味地寻找新材料。其实,他们这样说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已经熟悉了旧材料。新旧本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不了解原有之材料,又怎能够发现和判定新材料呢?除非是以旧为新。

材料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研究者应以平等开放的眼光视之,不能厚此薄彼。被认为重要可靠的材料,往往隐藏着故作的玄机;而不经意的材料则常常

①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450页。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更加近真。当然,变换视角,伪材料也可见真历史。近年来,史学界似特别重视日记的史料价值,各种各样的解密大都以此为据,专书不断涌现。有学者提醒说:“从日记内外看历史乃至看日记:不要以某一种日记为信史,应将各种相关日记相互参证,以求近真;不要简单地以为日记即第一手资料,应将各类文献比勘印证,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不要以日记所记即为全部事实,应掌握基本事实来看日记所记;不要仅仅从日记中各取所需地寻找自己要的材料。而要了解记日记之人的为人行事及其记日记的习惯方式。”^①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记日记者都不可能完全是为了自己看的,他们心中往往有不同的阅读对象,即使不是为了当世示人,也是为了后世示人的。他们时刻不会忘记的,是呈现一个怎样的自我,而很多时候又是理想的自我。大凡日记中所高唱者,恰恰为其实际所不能为者。一些记日记者远比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高明:如果不来点真的,记一些鸡毛蒜皮的缺点或错误,何以取信于人?所以,有时候,日记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为何这样记。若是以日记为史料,一是要揭示记日记者的各种未曾示人的隐秘心态,二是要从日记之外来解读日记所记,不能仅仅以日记所记为依归。

档案也是近年来史学界特别看重的资料类型。不少人甚至把有无档案看作一种学术成果的优劣标准,大有档案之外无历史之声势。诚然,档案对于研究某种历史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仅仅依靠档案,不仅无法认识历史的全貌,而且对于理解档案本身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有时仅用档案千回百折依然只能隔靴搔痒的人与事,在其他类型的资料当中早有明确记录,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势必事倍功半。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阅读其他资料有助于解读档案的本意和历史的本事,从而将档案放在适当的位置,起到成活一片的作用。”^②可能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些被视为至宝的档案,早已天下皆知。在近代中国,大量的政府文书、法规章程、会议内容、政党主张、中外关系、个人事略乃至友人通信,都刊登在各种类型的报刊之中。近代史料之多,很大程度就多在报刊上。相对于报刊,档案毕竟还是量少,且问题集中,容易把握,这也可能

①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4—95页。

②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是一些人高度重视档案的聪明之举。至今,报刊对于近代史研究的价值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些迷信档案的人,应该首先去查看同时代的报刊,再去蹲档案馆,可能更为聪明,到头来也不必再以笨功夫自嘲。

一方面,能否发现新材料,确能考验研究者的智慧;另一方面,若依靠掌握材料的不对等地位,甚至垄断材料,来炫耀高人一等,则不免格局太小,褊狭之心怎能做出大学问?事实上,各种类型的材料都很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不同类型的材料可以展现不同的历史,也可以共证相同的历史。即使最直接、最核心的材料,也不能见之即言,而应该多种材料互证。在很多情况下,按时空顺序排列各类材料,研究者无须多言,史事的本相自可跃然于纸上,且可使不同的读者领会其中不同的是非得失。

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①,胡适也讲,“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②但是,揭示前人的本意和史事的原相,可能有一分材料,还不能说一分话,而要有“三分证据”、“十分材料”才能说“一分话”。其实,若能善于呈现多种史料之下的史事,可能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即超越所有具体史料而呈现“史料之外的历史”。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能再复原,所能留下来的史料,相对于历史的客体,不过九牛一毛。从这一点上来说,大部分实际发生的历史还都在史料之外。如何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更能考验研究者的智慧。^③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最主要的是要善用史料。若能找到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则可使纷繁复杂的史实各自呈现。分科治学,是近代学术的一大特点。在史学研究中,历史也往往被分门别类,各种专门史的研究长盛不衰。实际上,历史是作为整体存在的,过于条分缕析,容易忽略本然的联系和复杂性。但是,再高明的研究者也不能使整体史一下子呈现出来。因此,研究历史,又必须找一个可再现整体的切入口。比如,选择枢纽性人物就可以带动对于整个历史的了解。而标志性期刊亦是呈现一时代之历史的重要窗口。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0页。

③ 张太原:《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创办报刊,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从“边缘”向“中心”努力的一贯路径,“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①政论报刊遂应运而生,并很快便成为知识人士“吸收同志”“鼓吹主张”的重要工具,不但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名人,而且更开创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学界与政界通过科举制度连为一体,共同居于社会的中枢地位。然而在近代社会,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界与政界失去了制度上的沟通渠道。掌握政治权力的多是“缺知识,少训练”的社会成员。这种状况,自然令受过“现代知识”充分训练的知识精英的心理失衡,他们看不惯那“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的“胡闹”。同时,在“内忧外患交迫”的近代社会,传统士人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世精神也很容易被唤起。因此,他们不安于“知识明星”的社会角色,自觉地走出书斋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自由知识人之所以还能称为一个群体,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是以某种报刊而聚集的。

一般来说,自由知识人所创办的报刊不是文化性的就是政论性的。胡适等人所创办的《独立评论》就是一个典型的政论刊物,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大致共同倾向的政治思想,其内容相当丰富:既有自由知识人本身对中日关系的处理态度,又有他们与国内各种对日主张的论争;既有他们本身的政治要求和建国主张,又有他们对国内各种政治主张或建国方案的评论。《独立评论》存在的6年(1932—1937),正是中国外患日益严重,政府渐趋专制,革命不断扩展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专制和革命并行,内忧与外患交迫的环境中,作为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一批知识精英,如何因应时势,如何来尽“爱国”的责任,显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主题和趋向。

五四后期,胡适曾明确地反对谈主义,并与李大钊进行了一场影响颇为深远的争鸣。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他自己竟然大谈起主义来,并把五四时期的自己也拉入了主义的阵营:“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6—177页。

反的。”^①1935年底,他在致汤尔和的信中说,当年陈独秀被驱出北大,是“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如果陈独秀不是丧失了其教授的“地位”,就不会“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而变得“十分左倾”,以致最终投向革命。^②考之于胡适五四前后的思想言论,似未曾见提倡过什么自由主义,至少还没有用过自由主义一词,所以,很难说存在一个“北大自由主义者”群体。这说明即使是当事人也很容易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对此,研究者应有高度的自觉,探究史事的发生演化进程,还是尽可能地回到原生状态。

实际上,自由主义概念和思想特征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与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进入20世纪30年代,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不但实现了自认,而且完成了他认。1931年,中共的宣传干部彭康指出,“胡适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③正是在自认和他认的基础上,各种思想交融、碰撞和竞争的进程中,胡适的自由主义者身份又逐渐获得了“公认”。可以说,那个时候,随着各种主义的分明,政治的分野也更加清晰。

①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第4页。

② 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1—282页。

③ 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第12—13页。

第一章 《独立评论》概论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传统的士蜕变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①事实上,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其本身又在做着重新走向中心的努力。被“边缘”化与向“中心”进身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社会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报刊作为西方文明产品,在近代以后逐渐走入中国人的生活,这是西风东渐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维新以后,办报成为读书人实现社会理想和表达对国家命运关切的重要手段,凡是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唱主角的新人物,几乎无一不是通过报刊来登场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大致可以通过几个刊物而划分出不同的时代,胡适就曾说:“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②时代由杂志所造,充分体现了杂志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③作为借助《新青年》暴得大

①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页。

② 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

③ 后来的李敖也曾谈到,“一九一二年以后,中国有名的几本杂志,真正影响人民的杂志,第一个就是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第二个是胡适办的《独立评论》;第三个是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第四个应该是台湾雷震办的《自由中国》;第五个是我李敖办的《文星》杂志。”(李敖:《李敖有话说》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29页)若说是影响知识分子的杂志更为贴切,而胡适与这五个杂志都或多或少地有关系。

名的胡适显然是时代的弄潮儿。而通过报刊取得社会权势的人要想保持对社会的影响力,要么参加政治活动,要么继续办报或著书立说。

一、《独立评论》的创办宗旨

政府之外的舆论在近代西方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也自古就有“清议”,但是并没有一个常规的附丽。进入近世以后,在东西文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民间的力量活跃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报刊”这样一种新的平台。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加深,报刊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章子”因而叹曰:“伟哉造物者,其以子为此巨史也。”^①更甚者,“一纸风行,捷于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害,往往随记者述叙之一字一句而异其结果。”^②既然报刊“势力之伟大”如此,“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③。那么,无法安于书斋欲在社会中有大作为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并且常“以舆论家自任”^④。事实上,胡适正是借助于《新青年》的舆论“暴得大名”^⑤,《新青年》“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⑥。

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在日记中写道:“(胡适)在北京这几年的经验所以使他发达的趋势改变,是很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做‘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

① 章太炎:《实学报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页。

② 《国闻周报发刊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③ 张默:《六十年来之申报》,《申报月刊》创刊号(1932年7月15日),第5页。

④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1915年1月22、2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9页。

⑤ 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

⑥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能迁移的古学古理上。活事是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如政治、学校事业、民族生活等。适之还没完全离开‘活事’,他还编他的《努力》周刊,还时常发表与现时生活有关系的文章。”^①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做“活事”的机会,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表现,而编《努力》式的刊物,“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可以说是他们保持“中心”地位或进一步向“中心”的“努力”。事实上,以报刊为媒介,形成了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做“活事”的传统。《努力》周刊后的《现代评论》和《新月》应该都是经营“活事”的体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就给胡适写信,建议他亲自出马,重操旧业,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②

虽然后来俞平伯并没有参与《独立评论》的创办或为之撰文,但是这一段话很能体现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愿望,即拥戴胡适以办刊物为“救国”、“强国”或者是“治标”、“治本”之道;自感要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只有办刊物造舆论,别无“可为之事”,这正是知识分子“边缘”地位的体现;但是在他们看来,“笔与舌”同样能够救国,同样能够作为社会的“中心”,“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果真如此,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中心”。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心”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社会中只有行政权力一种“中心”,而近代以后,舆论也逐渐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权势,以至于成为社会的另一种“中心”,这自然是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和设施输入的缘故,“抑近世国家所赖以治国范群者,不外法律

① 张彭春:《日程草案》,转引自罗志田:《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第28—29页。

② 俞平伯:《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页。

与舆论两端，而潮流所趋，社会舆论之取舍，视法律所赏罚尤为严切而有力。”^①在办报刊的人眼里，舆论甚至比法律更能规范社会秩序。

有人还更明确地呼吁，“大学教授要造成中心舆论势力以领导社会，监督政府：中国是向来无中心舆论的国家。尤其在独裁政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中心舆论更无从表现。大学教授如要拿出先觉者的资格冲破这重气压的氛围以领导社会，贯彻主张，就必先造成强有力的中心舆论。现在国内的几间大报馆，多半不是营业化，即是被某党某派的收买，求其能稍讲几句公正话的，又是浅薄脆弱，不足以号召社会。所以，在这严重的国难当中，我们如一日不能任卖国军阀舞弊欺骗，即一日不能无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真正舆论。大学教授要无疑地接受这领导舆论的责任，为民众的前锋。”^②

然而，在还没有建立起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的动荡年代里，中国人寄希望于舆论的主要还不是“治国”，而是“救国”，“救国之道莫逾于此”，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这几乎成了“智识阶级”的共知，比如，当时还有人更强烈地向胡适进言，“有枪杆到今日便应革命；有笔杆只好纠正及拟具方案，唤起全国同情，或谋一种有组织之团体。”^③从中不难发现其激烈情绪，但是，建议者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即以“笔杆”提出方案，“唤起全国同情”，从而形成“他人”之外自己的“势力”。

的确，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十分有限。丁文江曾说，“我们这班人”可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④。“乱世之饭桶”一语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地位。但是，他们并不甘于这种地位，他们同样渴望走向“中心”，担负起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其路径就是办刊物，尤其是办政论刊物，“政论报刊之目的与功能，在于造成舆论，借舆论以推动政治变革。”^⑤

① 《国闻周报发刊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② 抗争：《写在大学教授救国以后》，《时代与教育》第1卷第2期（1931年12月11日），第4页。

③ 敬：《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页。

④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⑤ 周佳荣：《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页。